

20 世纪二胡发展阶段的回顾与思考

蔡俊超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 二胡是中国当代民族乐器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它在今天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一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乐器,直到 20 世纪才得以极其迅速地发展。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推进,在刘天华、刘文金等人为代表的音乐家的推动下,二胡在音乐创作、音乐演奏、情感表达、社会地位等方面都获得了全方位的提升。回顾二胡在 20 世纪中几个阶段的改革,思考其人文内涵,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二胡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二胡; 器乐; 20 世纪

中图分类号: J63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0)05-0122-04

二胡是中国当代民族乐器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它在今天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晋唐的奚琴,宋代陈旸的《乐书》中就有关于奚琴的记载,元代史书中记载的火不思也与今天的胡琴十分相似。二胡属于拉弦乐器,由于它在线条性旋律的表现上有着特殊的作用,所以在进入中国社会后与民族音乐相融合的过程中分化为多样的形式,如从胡琴本来的样式逐渐分化成二胡、京胡、板胡、高胡等。

一方面它们成为中国各地区民间器乐中重要的旋律表现乐器,为中国近代民间器乐各乐种及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明清以后中国戏曲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京剧在徽班进京后的繁荣、乐队伴奏音乐的逐渐完善成熟、京胡对京剧的作用和意义等因素,使得胡琴得到极大的发展,几乎成为中国最富民族性格的乐器。

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即使在胡琴类乐器中间,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现。例如,京胡作为中国国粹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而地位显赫,而二胡则由于其主要流行于城镇和乡村,并大量存在于流浪乞讨的艺人中,使其在许多年里始终处于低下的地位,从而使二胡在 20 世纪前的发展十分缓慢。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中国整个民族自尊心的上升,西学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推动,使得大批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和面对中国的传统

文化,一场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改革运动逐渐形成。其中包括音乐方面的变革,如学堂乐歌、国乐改进社的出现等,这些都为二胡在 20 世纪的变革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胡是一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乐器,但是只到 20 世纪它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对我们今天民族音乐的发展有什么启示?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胡在 20 世纪几个阶段里的发展进行回顾和思考,并力求寻找一种答案,给我们今天的音乐工作者以参考。

一、二胡在 20 世纪发展的几个阶段

二胡在 20 世纪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1949 年前刘天华对二胡的改革;1949 年至 1966 年间二胡的进一步发展;80 年代以后对二胡的进一步创新。正是这样的几个发展阶段,使二胡艺术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1. 1900—1949 年的改革

刘天华对二胡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了解的文化人,他还具有良好的西学传统,这也是其改革成功的人文背景。这一改革首先体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他并没有简单地搬用一些民间曲调来作常规的发展变化,而是通过对大量的民间音乐素材重新进行具体细致的融合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很难从他的旋律中找到十分熟悉的民间曲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作音调,在这一点

上刘天华超越了他后来的许多音乐家。其次,刘天华在音乐创作中十分重视对音乐情感的表现。创作的美学目标是通过他丰富、成熟的写作手法来获得的,对旋律的充分追求是他二胡创作的重要特征,对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达十分准确,这在他的《良宵》、《空山鸟语》等作品中均有显示,这也充分展示了刘天华情感美学的观念与标准。

刘天华自幼对中国民间音乐耳濡目染,而对西洋作曲技法的学习,又使他能游刃有余地“洋为中用”。在二胡创作中,他能将西洋作曲技法与作品的内容、风格以及中国音乐特有的手法相结合,共同表达思想情感,这在《光明行》中有生动的体现:以五声音阶为骨干的大小调、典型的复三部曲式、三拍子的节奏型等。这首作品所展现出的高昂、振奋的精神为二胡开辟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

在二胡演奏的技巧方面,刘天华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有小提琴演奏的基础,他将小提琴的许多技巧移植到二胡上,使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大大扩展;它还模仿西方乐器的练习模式创作了许多练习曲,从而丰富了二胡的表演技术。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的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等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增添了二胡艺术表现的深刻性。

这一时期,二胡领域重要的音乐家还有民间艺人阿炳(华彦钧)。阿炳精通各种民间乐器及道家音乐,经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曹安和教授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等二胡名曲。然而,由于社会地位等原因,阿炳更多地只是代表他个体,他没有更多地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创作理念。将二胡教学和表演引入大学课堂和音乐会舞台的是刘天华,刘天华扭转了二胡社会地位低下的局面。当时二胡仅作为一件伴奏乐器在合奏中运用,一般用于业余爱好者自娱自乐,甚至是行乞时的工具,一直以来难登大雅之堂。刘天华从创作、演奏、教学几个领域全方位地进行了变革,使二胡从此迈入了音乐会的殿堂。事实证明,二胡具有非常深刻和广泛的音乐表现力,只是在相当长的岁月里被埋没了。在刘天华以后的时期,无论是独奏还是合奏,二胡都在民族乐器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刘天华在二胡音乐创作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1]。

2. 1949—1966年的发展

1949年后,万象更新,整个民族音乐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许多作曲家对二胡报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二胡独奏曲的创作中。他们通过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以及对西方音乐的了解,逐渐认识到拉弦乐器本身的表现力和其在乐队中的重要性。当时关于小提琴、大提琴的研究就有大批的文献,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优秀的二胡独奏曲应运而生,如《春诗》《赛马》《山村变了样》《秦腔主题随想曲》《奔驰在千里草原上》《草原新牧民》《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等等。这一阶段二胡曲的题材主要表现新中国新的精神面貌,音乐素材基本上采用民间音乐的旋律发展变化,他们以朴素的音乐语言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这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则是刘文金。

刘文金在1966年的二胡代表作就是《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较以往的二胡创作,刘文金在创作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以《豫北叙事曲》为例,叙事曲是西方音乐的体裁,这里作者并没有完全采用西方体裁中的含义。这首乐曲十分具有二胡的特点,它有两个主题的情绪对比,在主题的创作上突破了歌曲化的写作手法——在当时有许多乐器作品的主题基本上都是运用歌曲形式,然后进行发展变化,这无形中就限制了乐曲的发展空间。《豫北叙事曲》克服了这样的局限,器乐化是它鲜明的特征,它主要是通过音乐的呼吸句法、音域的扩展、材料的充分展开等手段来获得的。其中第三部分作者安排了一个散板性质的独白,这非常有特点,有点像西方协奏曲中间的华彩乐章,体现了鲜明的器乐性。虽然也是表现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这在以前的一些作品里也有过,但显然《豫北叙事曲》走得更高更远。同样,《三门峡畅想曲》中的器乐性从开始充满动感的跳跃主题中就能感觉到,它也是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果,虽然是赞美性的,但作者没有简单地以一种概念化的语言加以叙述,而是投以真实、自然、朴素的感情,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上述两部作品是中国二胡曲创作的里程碑,它们继承了刘天华的创作传统,但是在对西方音乐的吸收上更加成熟和丰富,并且更加自然地和中国传统音乐融合在一起。其旋律完全是中国式的,但采用了许多西方音乐的表现手法,从而扩大了二胡的表现力,又依然保持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这将二胡所表达的精神内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外,在结构形式上,这在当时是属于比较大的作品,而且还用钢琴伴奏,这些在二胡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里作者

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三部曲式,而是从内容要求出发,以符合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灵活地对乐曲的结构做了生动的处理。如《三门峡畅想曲》像一个回旋曲,但又不完全是回旋曲,因为每次主题出现时总有变化,而《豫北叙事曲》更是一个能做出多种解释的形式。另外,叙事曲是西方音乐的体裁,畅想曲则是作者自己的创造,但它们毕竟都是形式,作者并没有拘泥于此。当然音乐表现形式总是为思想感情服务的,无论怎样,它们都准确形象地表现了作品力求表达的精神面貌,并且对同时期包括后来的民乐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3. 1980—2000 年的创新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二胡音乐的创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的大量文化包括音乐文化逐渐进入我国,特别是西方的一些比较新颖的作曲技术、音乐元素被许多音乐家所熟悉,并被运用到他们的创作中。另一方面是许多音乐家依然遵循传统的手法来创作,而手法比过去更为成熟。刘文金的《长城随想曲》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它是一首三乐章的二胡曲,形式类似西方的协奏曲,内容主要表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以及作者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在写作手法上刘文金还是秉承自己的传统风格,但因为乐曲的篇幅较大,对材料的运用更为复杂,乐曲中还有对戏剧性场面的描绘,作为二胡曲的写作具有相当的难度。这部作品可以算作刘文金的三部曲之一,虽然从表现力上及深度上都要超过前两部,但由于时代的不同,其影响力客观地说都不及前两部。这一方面的作品还有《红梅随想曲》《新婚别》《兰花花叙事曲》《洪湖人民的心愿》等,这些作品基本上还是沿袭第二阶段的风格,一般都是采用歌曲主题进行陈述和发展,其模式常常为第一部分是歌曲化主题陈述,中间部分是发展,一般都有戏剧性的对比冲突,第三部分则是变化再现。与第二阶段的作品相比,它们的结构和演奏技巧都有很大的提高,音乐的表现也更为复杂,但基本的风格还是一致的。所以 80 年代后有代表性的还是采用一些新技法同时又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如《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一二胡协奏曲》《天山风情》等,这些作品又运用了一些新的手法,使音乐表现力得到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在表现一些少数民族的民俗场面时有着比较理想的效果。另外,在对二胡的器乐化的挖掘上表现出很大的开拓性,从而为二胡表现戏剧性的场面奠定了基础。这

些作品也逐渐被社会所承认,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用二胡表现了一个人们并不熟知的领域,同时又具有十分理想的音乐效果。

对于这一阶段两种写作风格的二胡作品,在这里并不想评论谁优谁劣,或者说它们之间也不存在谁优谁劣,它们只是代表了不同风格的创作方向,也说明了不同欣赏群体的音乐需求。应该说 80 年代后的二胡创作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这也预示着艺术健康发展的道路。21 世纪的今天,无论是二胡艺术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均是以这种开放的机制可持续地发展着。

二、二胡在 20 世纪发展的总体特征

二胡作为一件曾经存在、流传于民间底层的乐器,在 20 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发展甚至超过了之前几百年的进程,它的命运在 20 世纪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认为它属民族乐器中变化最大者也不过分。20 世纪二胡艺术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二胡的物理性能。过去的二胡制作十分简单,以致在许多音区几乎无法表现,这也同时影响到它的换把,从前的二胡按照其性能是很难换把的;另外音响的共鸣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一切都建立在其性能改变的基础之上。其次是二胡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平民百姓自娱自乐的“玩具”,逐渐发展为音乐会中专门的独奏乐器,同时也成为高等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其硕士学位的设置和确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二胡的表现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刘天华之前,二胡主要以演奏城市乡村小曲或曲牌为主,表现内容多是一些单纯的情绪,像阿炳那样的民间创作实属罕见。刘天华的作品虽然也表现个人情绪,但感情更为深刻、细致、复杂;在刘天华之后的阶段,二胡曲的表现领域几乎拓宽到所有的音乐题材范围:民族、国家、个人、风情等,从本来只能表现一些抒情歌唱性曲调发展为能表现宏篇的戏剧性场面,既有文曲又有武曲,既能抒情也能叙事,刚柔并济,雅俗共赏。最后,二胡现在不仅是重要的独奏乐器,更是民族乐队里主要的旋律乐器,我们目前的民乐队的编制基本模仿西方的交响乐队,二胡也就类似小提琴成为乐队中主要的拉弦乐器。

三、对当代的启示

一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乐器为什么会在 20 世

纪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笔者认为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些仁人志士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民间文化的魅力,刘天华便是这样的身体力行者。其次,二胡本身就有着独特的表现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有挖掘的可能;只是长期被埋没而已,而且这是社会对它的误解和偏见所造成的,解决的方式关键是社会观念。另外拉弦乐器是所有乐器中最富于歌唱性,最具有旋律表达力的,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拉弦乐器始终不发达,使整个乐器种类的发展很不平衡。

通过对西方乐队中小提琴、大提琴作用的了解,因此自然加速了二胡的发展。二胡的发展对民族乐队的发展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乐队合奏性音乐的成熟必然又进一步影响独奏音乐的发展,这形成了良性循环,二胡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是必然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而历史的必然性早已蕴含在二胡艺术的内外历史环境中。

通过对二胡在20世纪发展的回顾,可以体会到:一是民族音乐的发展其实有很大的潜能,它需要大量的音乐工作者去创造和开拓。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深入吸取民间音乐的养料,还应该吸收许多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二是音乐创作必须走在改革的前列,并且这种创作既要考虑到音乐本身的内容,又要注意对乐器自身表现性能的发展与挖掘。只有坚持音乐创作是第一性的,音乐演奏是第二性的,才能逐渐提高整个乐器的内容和形式之水平,只有以这样的内容和形式,在新时期的今天才能更准确,更富有艺术性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

参 考 文 献

- [1] 乔建中. 四十年来小型民族乐器作品的创作[C]//乔建中. 土地与歌.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368.

Review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everal Stages of the Role Erhu Played in the 20th Century

CAI Jun-c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000)

Abstract Erhu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oday's music creation and music life. However, as a centuries-old musical instrument, it was unable to develop rapidly until the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owing to Liu Tianhua and Liu Wenjin's great effort, erhu gets a comprehensive upgrade in music creation, music performance and emotion expression and its social status has also been improved.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erhu to recall the several stages of the reform of erhu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nd to think about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Key words Erhu; musical instrument; the 20th century

(责任编辑:刘少雷)